

女兒胸有凌雲志——從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看 一個女人自覺後的自決

張郁屏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碩士班

摘要

五四時期的作家多有寫日記與自傳之習，自傳體文學亦十分常見，此類文體是經由作家自我審查後之紀錄，從中可得知當時代之環境、民風思想。本文選擇五四女作家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作為研究對象。

楊步偉(1889-1981年)，祖籍安徽池州石台縣。一個自認普通道地的中國女人，自認並無特績與社會和國家，其實不然，楊步偉有著新時代女性知識份子的女性自我意識覺醒。本文擬從《一個女人的自傳》分別就婚姻、教育與爭取工作權三個層面，剖析楊步偉身為新時代女性知識份子，其女性意識覺醒的歷程與意涵，進而探究其自覺後的自決之意義。

關鍵字：楊步偉、《一個女人自傳》、五四女作家、女性知識份子、女性意識覺醒



一、前言

晚清以降，時局丕變，國事蝸蟻，在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獨立人格觀念衝擊影響下，向來為中國社會所忽略的婦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經新思潮不斷衝擊與蛻變，中國婦女有了嶄新的定位與角色。

學者鮑家麟探討民初的婦女思想時，開宗明義提出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中，產生了「中國真正的革命」。鮑家麟所稱的真正革命，指的是中國婦女的覺醒¹。檢視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思潮，不可否認的，中國近代開始關注婦女獨立人格的生活，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是國民自覺運動，是社會文化改造運動，沉寂於軍閥紛戰的女權意識，再度受到國人的重視，此時解放女性的意識高揚與中國近代政治、社會的變革，關係密切。然而，女性在中國社會真正獲得獨立自主人格，也由此開始。根據梅生於1923年所編纂《中國婦女問題論文集》，五四時期引發知識界及社會大眾熱烈討論攸關婦女的議題，有女子教育問題、生活問題、參政問題、生育制度問題、家庭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離婚問題、獨身問題、貞操問題、女子心理問題、剪髮問題諸類等等。婦女的人格問題是五四時代婦女解放關注焦點，一方面反映出女性首度可能脫離民族主義和國家問題的附庸地位，作為獨立被關懷的主體，重視女性主體性曙光乍現；另一方面，尋找女子人格的關懷，更多新女性勇於走出家庭，並向封建社會餘毒抗衡挑戰，要求教育、戀愛、社交、婚姻、政治、法律等權利。顯而易見，和清末女權思想不同，五四婦女的解放重心在於婦女生活問題實實在在的改造。具體而言，五四新時代女性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孕育而成長的。

自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來，對中國政治及思想的革新，絕大部分是由男性知識分子主導。在男性知識分子的主流文化及時代思想變遷潮流所趨，五四女性知識分子受到教育的啟蒙，在守舊社會中漸漸嶄露頭角。這些生於清末，長於民國，受過新式女子教育，五四時代解放思想洗禮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們致力爭取女性教育平等權利，要求婚姻戀愛的自由，提倡經濟獨立自主，參與社會改革活動，力倡婦女群體普及的權利與均等的地位，甚至由性別

¹ 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縣：稻香出版社，1999年，頁305。



界限的突破，迎向婦女階級意識的剷除。五四女性知識分子展現近代中國新女性多元的風貌，也象徵著中國女性意識嶄新時代的來臨。

女性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創立與五四婦女解放思潮建構下的產物，也是中國近代女性意識覺醒的最佳例證，本文釐清五四女性知識分子——楊步偉之女性主體意識之自覺後的自決(決定、決斷如何作為)。藉由女性知識分子楊步偉的成長歷程，闡釋五四時期楊步偉之女性意識與作為，所呈現其時代的意義，並重新做一省思。

欲了解五四新文化婦女解放思潮的興起，則必須勾勒出五四以前傳統婦女在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及其地位。胡適1922年6月在安慶演講中的一段話，說出了中國婦女的苦楚與無奈。他說：

我們以前從不將女子當作人：我們都以為她是父親的女兒，以為她是丈夫的老婆，以為她是兒子的母親；所以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話，從來總不認她是一個人！在歷史上，只有孝女，賢妻，烈女，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

這是五四時期以前中國婦女所呈現的大體面貌。胡適的一句「在歷史上，只有孝女，賢妻，烈女，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道盡了傳統中國女性受到父權約束，女性沒有自我意識的歷史真相。

但有些歷史真相似乎可從這時期的作家所寫的日記與自傳中窺知一二，因其多有多有寫日記與自傳之習，自傳體文學亦十分常見，此類文體是經由作家自我審查後之紀錄，從中可得知當時代之環境、民風思想。本文選擇五四女作家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作為研究對象。

楊步偉(1889年3月~1981年)，小名蘭仙，本名傳弟，又名韻卿。混名為大腳片、公道鬼、天燈桿子，祖籍安徽池州石台縣，祖父楊仁山，繼父楊自超。一個自認普通道地的中國女人，自認並無特績與社會和國家，著有《一個女人的自傳》、《雜記趙家》、《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中國婦女歷代變化史》，譯有《女子應有的知識》。本研究發現這位新女性不僅有自我意識，而且自覺自決。至於這本自傳之內容題材如楊步偉所說，是「寫出我自己五十年的經



歷中應記的和可記的事情來，很少遺漏的，因為寫的都是事實」²，更詳細的說，其題材有四：

第一是我自己家庭的新舊改革，第二是國家民族的革命及後來內戰爭奪，第三是在兩朝內外來的侵略，第四是世界兩次大戰都在我這大半生中碰巧遇到了，並與我個人都有一點關係。³

楊步偉更說了作傳目的，「我都是寫真事情的回憶，也就不在乎我的文學夠不夠就寫得了」，因此有人批評她寫作風格像寫一部小說似的，但楊步偉卻自覺得她「對各方面不過以實記實的回憶，只有遺漏的未寫而已」⁴，可知其文學性不足，純為寫實記錄，文章並夾有貌似與讀者對話之句，因此本文將不探究其文學價值，

而將重心置於楊步偉的婚姻、社會參與各方面的分析與探討。她具備了五四新女性的時代性、思想性、社會性與重要性之特性。時代性方面，本研究中的知識女性生於滿清末末，在五四時期成長。無疑地，參與了五四的歷史事件與時代進程。思想性方面，楊步偉受過新式教育啟蒙以及新思潮洗禮，思想的先進與革新，足以反映出五四時代新女性的想法與心態。社會性方面，雖然女性知識分子中唯有董竹君出身普羅階級，但是大致說來，在本研究中所有女性在成長過程所經歷的人生歷練與歷史事件，代表了五四當代女性的個人發展與社會生活之最佳寫照。重要性方面，五四運動時至今日已近百年，但在本研究中的知識女性對中國文學、教育、政治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依然深遠。甚至我們可以說五四時期女性知識份子本身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女性知識分子具有引導社會思潮及革新風氣的地位與能力，社會一般婦女，包括下階層的婦女，都容易受到她們的影響。因此，對中國婦女界而言，這些女性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時代性、思想性、社會性、重要性，都是無庸置疑的。所以，研究中的知識女性——楊步偉，是值得深入探究與分析。

另外，本研究分別就婚姻、教育與爭取工作權三個層面，來剖析女性知識分子——楊步偉的女性意識覺醒的歷程與意涵。三個層面的研究，是因為婚姻被稱為終身大事，許多中國女性自幼就被家長指定婚事，婚姻自主可說是新女性掙脫

²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

³ 同上註，頁 2。

⁴ 同上註，頁 1。



父權社會桎梏的第一步。接受教育，是讓女性有知識、能思考、有能力並激發其行動之原動力。在高談獨立自主人格理想時，經濟問題是每位女性必須即刻面對的現實難關，經濟壓力不容小覷，因此必須爭取工作權。換言之，婚姻、教育、爭取工作權三個層面可以說是女性知識分子必須面臨的難題，同樣也是促發她們女性意識成長的動力。所以本研究以婚姻、教育、爭取工作權三面，來探究楊步偉女性自我意識自覺後的自決。

二、楊步偉婚姻自主意識的覺醒與積極行動

楊步偉出身於富貴家庭背景⁵，這樣的家世賦予其外出甚至出洋接受教育的機會，之後甚至成功地自主退婚，與自由戀愛的趙元任結為夫妻。這與一般女性知識分子的婚姻狀況，有著極大迥異。一般女性甚至女性知識分子之婚姻是封建思想建構與新時代思潮擺盪下的產物。尤其名門世族的大家閨秀自幼指婚，必須承受家庭的束縛，在孝道的高壓下，女性被迫順從指定的婚姻，因這種婚姻可說是傳統家庭延續氏族的原動力。

「我就是我」⁶是楊氏正視自己的存在與價值，並明瞭自己是行動主體的證明。她主觀上感受到男女的不平等或女性受到壓迫，能覺知自己主體性及自我是女性的認同，認真的看待自己。認為女性應與男性一般，在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擁有平等權利的參與者，是指「人權」的認同。放大觀之，楊步偉的女性意識涵蘊了女性對於作為「人」的主體與作為「婦女」群體之自覺自醒。她明白唯有透過自己的行動與付出，自覺自發地去爭取女性的價值與權益，以謀求改善女性的社會地位，而這需擴及「運動」的層面。

(一)反抗包辦婚姻

女性知識分子為何堅決反對盲目的家長包辦婚姻制度？其因為她們意識的

⁵ 楊父曾任職廣東撫台衙門總會計(相當於現今財政廳長一職)、海寧鹽務縣知事。

⁶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4。



覺醒是來自於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目睹身邊女性親友與眾多婦女同胞受到婚姻制度的逼迫，感到舊式婚姻女性們的苦痛與傷害至深且鉅，尤其是受苦的婦女可能是知識女性的母親、姐妹或閨中好友，她們的感受益加深刻。

1919 年 11 月 15 日，長沙《大公報》以〈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為題，率先報導趙五貞自殺事件⁷。殷柏強調，趙五貞自殺太趨向於「消極的方面」，而沒有實行「自由戀愛」或「逃亡」等積極辦法，因而是「可惜」的。⁸相較於趙五貞，楊步偉在自傳中將成長過程中親眼目睹自己的姑母、表姊和兩位姊姊，因為無法與心愛之人自由結合或者拒絕成為小妾，寧願選擇在家吃素戴髮修行而不願意出嫁，雖不似趙女那般強烈手段，但也不亞於了。見到週遭的女性至親與中國婦女同胞，毫無反抗能力成為父權制度「吃人禮教」的祭品，受到近代新思潮洗禮的她們，不願意步上後塵，成為凡事聽天由命、任人擺佈，將自己的感情交給他人去決定的父權奴隸。楊步偉選擇積極突破父權式指定婚姻，彰顯女性追求情感歸宿，創造自己幸福自主權利的女性意識高漲，對於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的嚮往與傾心。知識女性的反抗與革新，成為新女性追隨新時代潮流女性意識的體現。

深入探究女性知識分子對包辦婚姻的抗爭，知識女性們堅持女性應該擁有自己的婚戀抉擇權利，勇於革新，拒絕將女性的身體作為父權家族鞏固權力下的犧牲品。另一方面，父母命的包辦婚姻可以說就是中國封建制度舊勢力的化身，違背父母指定的婚姻，就如同女性知識分子正面、公然向貶抑婦女尊嚴，剝奪婦女人格⁹，忽視女性自由意志的舊禮教社會環境與父系家族宣戰。她們要堅持自己

⁷ 「長沙南陽街 22 歲的趙女」曾在某學校畢業，工刺繡，善縫紉，遵循父母之命，擇配吳姓商人為夫，於 1919 年 11 月 14 日舉行婚禮。婚禮採用傳統形式，新娘乘坐喜轎由吳家的接親隊伍迎娶入門。然而，迎親隊伍「行至青石橋協中孚南貨店門首，抬喜轎者忽見新娘轎內滴出鮮血，牽絲不斷」。待隊伍到達吳家門外，媒人揭開轎簾，「但見新娘仰面而臥，頸項割有刀痕，寬約寸餘，血如泉湧，奄奄一息」，「隨在轎中尋出剃頭刀一把，早已鮮血模糊」。後雖經搶救，新娘還是於當天身亡。」。詳見〈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大公報》（長沙版），1919 年 11 月 19 日。

⁸ 「(趙女士)不拿他的積極主張顯耀他那「冰清玉潔」似的精神出來，和現在這些講「解放」、「改造」的人，同在這黑暗污濁的社會裏，大大做出一番奮鬥的工夫，倒要這些講「解放」、「改造」的人，用「嗚呼哀哉」的字眼，來歎息你，用「自由戀愛」的牌子，來尊崇你，這樣我就要說你的性質太懶惰了，精神太腐敗了，拼命一死，也不見得在社會上有甚麼樣的代價。」詳見殷柏，〈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的批評〉，《大公報》，1919 年 11 月 19 日。

⁹ 吳潤凱，〈被挾持的自殺：「五四」婦女史觀的製作〉中提到，「女子人格，即「女子精神的獨立」，是新文化精英倡言婦女解放的立論起點。他們一方面指陳女子精神自由受到社會束縛而不得獨立，因而亟需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尋找或者構建具有獨立精神與人格的女子，以樹立榜樣，並證明女子獨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二十一世紀》網路版，二〇〇八年三月號，總第 72 期，2008 年 3 月 31 日。



的理想，掙脫舊式社會的婚姻奴隸地位與悲劇宿命，以及與外在封閉環境與親情壓力的抗衡，同樣展現了女性們違抗舊式婚姻制的時候，確實需要無比的毅力與堅強的意志。不過，這也正是五四時期女性知識分子主體意識覺醒的最佳例證。

論及自己主動退婚的新女性，首推楊步偉。出身望族的楊步偉，說自己是先訂婚後出世，因為在她未出生前，就被長輩指腹為婚而定了終身。原先衡量自己的婚事是兩家的事，可是楊步偉又覺得：「這是個人與個人的事情，我既然主張個人的自由，應該由我寫信提議退婚」¹⁰。就讀上海中西女塾時，楊步偉自己寫信要求退婚，因為她相信「一個人要改革一樣事，總要有犧牲的才能成功」，即使覺得負了訂婚對象的好意，但是「我只能對他抱歉就是了，我不願意因此不做」¹¹。楊步偉遇到婚姻阻礙，毫不退縮的勇氣與作風，突破中國女性長久以來委曲求全、犧牲自我的宿命心態。直至退婚成功後，楊步偉說：「這就把十九年以來的仗給打勝了，現在可以算是無條件的自由了。我有生以來到現在第一次我才是自己的人」¹²。楊步偉的感受不僅代表她個人擺脫婚姻枷鎖，成為自己主人的感動，這也是中國千萬婦女同胞努力的目標。

除此，迥異於傳統中國女性羞赧談論婚姻的權益，楊步偉在提出退婚時，並不同意以自己將來的婚姻作為犧牲的代價。在父親提出要她在退婚信上聲明自己將來獨立不嫁的附帶條件，楊步偉的回答竟然是：「那太可笑了」。她的理由：

第一我不要再有條件的改革婚姻制度；第二他也不見得為著和我退了婚將來就不娶，我何必白貼在裡頭呢？第三因為這個緣故，我更應該嫁才能給這個風俗打破。但是我嫁不嫁須看我將來認識的人而定，我自然不會專為破除風俗亂找一個人來嫁，自然有好的我才嫁呢。我現在何必要來一個聲明管著我自己將來不和男子來往呢？¹³

綜觀楊步偉自己寫信退婚歷程，不但表現出她改革自我婚姻的企圖，她更不願意為千百年教育節婦烈女的女德或女教所約束，堅定地拒絕用自己未來婚姻與幸福，作為解除婚約的代價。比起那些在家庭逼婚壓力下自殺或出家的女性，楊步偉作風更能展露新時代女性挑戰舊式婚姻及追求自我幸福的新精神。

¹⁰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6。

¹¹ 同上註，頁 79。

¹² 同上註，頁 80。

¹³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9。



眼見女性群體在中國社會婚姻中被動、無能、受害的情形，是引起女性知識分子極力抗拒舊式婚姻時不容忽視的重要環節，然而她們身旁女性重要他人的悲劇，更是起了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二)實踐新式結婚

女性知識分子不但抗拒包辦式的婚姻，並以新式婚戀的方式，表明自己追求婚姻自主的權利，不只是理想，而是積極的行動。楊步偉掙脫傳統指婚的枷鎖與家庭包辦婚姻的束縛後，選擇以公開交往、自由戀愛，進而在北京開設醫院時，與趙元任以新式結婚方式相戀成婚，來完成自己的終身大事。充分流露出女性知識分子深刻體認婚姻制度的改革，不僅僅只是反抗封建家庭舊勢力，或者單方面表達自己對婚姻戀愛的憧憬，知識女性們積極而務實的行動，另有一番爭取女性自主意識的重要意義。

女性在婚配過程中，永遠是被動的、被宰制的對象。民風未開之際，女性即使十分不滿意指定婚姻，但她們除了接受婚事，別無選擇的機會，甚至沒有拒絕的權利。若是執意要規避自己不中意的婚事，唯有消極的不婚，亦即，以完全犧牲將來追求婚姻幸福的權利作為代價，再無他法。楊步偉的家庭中就有被迫終身不婚、出家，來換取自己自由的拒婚女性之例子。

在楊步偉讓父親過目自己親筆寫好退婚信時，楊父就希望她「在信上加上一筆聲明犧牲你自己不嫁，將來自己獨立」¹⁴的聲明，這是楊步偉拒婚，而被家長要求放棄未來幸福的親身經歷。另外，楊家的其他女性就不像楊步偉般的幸運。根據楊步偉自傳中描述：

我的兩個姊姊和一個姑母，一個表姊也因著婚姻制度的不良，不肯出嫁。祖父雖新，力量只能到他們不願嫁就給他們的自由不嫁，可是無力改良到婚姻自由的程度，因為社會的情形全國都不自由，在那君主時代若提倡改良這個改良那個就說你運動革命，要殺頭的。所以他們四個人都不剃頭，在家內打扮都和平常人一樣，就是吃長素而已。過了多年第二的姑母因和我祖母吵嘴在一個晚上氣的忽然給頭髮剪了，其餘三個人都是所謂的戴髮

¹⁴ 同上註。



修行。¹⁵

由她們的實例可知，「削髮為尼，終身不字」實在是女性不願意接受安排的婚姻或無法與心儀之人結合時，寧可終身不婚的獨身主義，可謂是封閉環境中女性們不得已消極反抗婚姻的方式。由楊步偉的記述中，顯示出民國以後婚戀自主風氣漸開的社會，即使有部分家庭長輩有著願意改革婚姻陋習的想法，卻敵不過社會整體封建遺毒的固著力量，無能為力下，女性只有以終身不嫁和長伴青燈的消極模式，表達自己對婚姻制度及父權體制的抗議。對父權社會來說，拒婚的女性已經明顯的抵觸父權規範，要求拒婚的女性立志終身不嫁或出家，是對她們的一種懲罰。換言之，獨身等於是懲罰不順從或者藐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系倫理道統的頑強女性，注定她們要接受一生孤寂的命運。

對於傳統婦女，選擇終身不婚或出家為尼是迫不得已的消極反抗方式；但對五四新女性而言，寧可終身不婚的獨身主義，是另有一番向父權體制積極抗爭的新意義。五四新女性認為獨身所代表的不婚或拒婚，表示女性開始覺知到自己應該有婚姻抉擇的權利，拒絕繼續扮演被父系霸權操弄的玩偶。在沒有真正自由幸福的婚姻時，她們寧可獨身，也不願意屈服於受人操控的不自由婚姻，意味著傳統父權壟斷婚姻制的改變與女性意識的自覺，已漸漸露出曙光。

楊步偉一向事事具有革新精神，與趙元任結婚當時，楊步偉就堅持：

我們兩個人所想的結婚的事，並不是要好奇引來人注意，我們的理由是第一想到結婚這個事只兩個人的個人關係最大，而別人不過加入熱鬧而已。……我們是完全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所以拼命的想到只表示婚姻是兩個人的關係，與家族無關。¹⁶

所以，楊步偉結婚儀式很創新也很簡單，創新簡單到僅由胡適、朱徵在兩人自製的結婚證書上簽名作證，幾乎什麼儀式都沒有，卻成為轟動一時傳為美談的「新人物的新式結婚」。甚至兩人的結婚革新到聲明只收詩畫，故將趙元任姑母家送來的鮮花退回，因此得罪了趙家姑母，而造成多年不來往的後遺症。在新式知識人士改革婚姻的風潮中，楊步偉和趙元任簡單的新式結婚方式，不但轟動當代社會，而且也引起時下青年學習的風氣。事後楊步偉回憶被當時《晨報》以顯著大

¹⁵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90~91。

¹⁶ 同上註，頁 215。



字標題報導的新式人物的新式結婚，她說：「我們當年這無儀式的結婚儀式，不但是在那時轟動一時，就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還要說學趙元任夫婦的結婚儀式，但是沒有一次學得像了」¹⁷。楊步偉的話證實當年她婚禮的新式創舉，引發簡單創新儀式結婚的風潮，實際上她的革新婚禮與當時代社會積極改革傳統規範禮教陋習的熱烈思想，真有不謀而合之處。楊步偉新式結婚方式，呈現出的是新生代女性願意摒棄被動且繁瑣無意義的結婚儀式，跳離傳統禮教的制約。她對婚姻舊俗惡習的革新勇氣與堅持，自然而然成為急欲改革虛偽門面婚禮的新派人物與學生青年，傾心學習與仿效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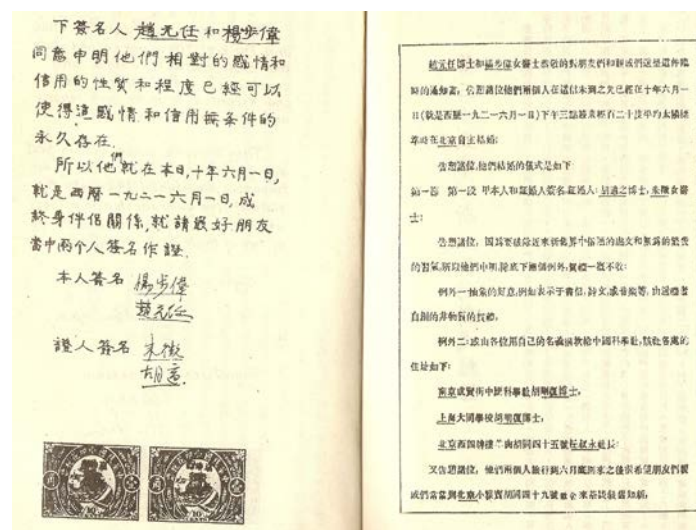


圖2-1 楊步偉結婚之婚書與寄與親友之通知書。¹⁸

三、楊步偉教育自主意識的覺醒與積極行動

晚清興女學風氣漸盛，傳教士、國內地方知識分子、士紳或清政府官方創辦的女學堂日益增多。女性知識分子對家庭啟蒙教育的重視與其日後入新學堂的發展，實際上具有相輔相成之功能，在楊步偉身上得到有力的見證。女子教育方

¹⁷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215。

¹⁸ 圖源：同上註，頁 212~213。



興未艾，女性得以進入向來被視為是男子專擅而為女子禁地的知識殿堂，改變傳統女子無才是德的錯誤觀念，女性權利與地位提昇也出現了一線曙光。

楊步偉心甘情願拋棄校長的頭銜遠渡東洋，從日文最基礎字母學習起，實在是因為她曾經參與辛亥革命黨行動的經驗，表象上革命行動的參與讓女性加入國家事務和活動，更多自主性空間。實際上，讓楊步偉感受到的卻是女性在革命事業裡並沒有真正的特殊卓越貢獻，女性參加革命黨的行動只不過徒具提昇女權的虛名，點綴的意義多於實質的貢獻，所以中國男女平等的理想仍有待努力。因為楊步偉發現：

革命總機關在總署裡，有時開會我們也去，淨打算北伐的事。我們不過夾在裡面，並無大事給我們辦。有時女人開特別會，打算要求女權平等種種事，我也插一兩句。¹⁹

顯然，楊步偉已經體會到婦女在革命事業裡沒有真正地位，表面上婦女是參與國家革命的行動，實際上未受到社會真正尊重的殘酷本質。由此可知，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並未獲得父權體制的真心認同。要突破男流意識形態對女性設下的防線，知識教育無疑是能夠賦予女性權利的利器。如此的體認，讓楊步偉抱持：

我們要平等，要真正的平等，我們女人第一要先受同等教育，有同等知識，能同樣吃苦，同樣做事，才能得到同等待遇，才是真正平等。若只要求特殊權利，不能同等行動不會真正給我們平等的。²⁰

楊步偉體會女子的知識和學問與男子無法齊頭並進時，唯有「第一要先受同等教育」²¹，等待女性有和男性相同的知識，男女真正平等才有希望。若是女性沒有知識的基礎，即使獲得男女平等的權利，也未必能為國家民族做同等的貢獻。因而楊步偉決定：

沒有革命以前我只希望革命，現在成功了，我覺得不但我們女子不夠資格，男子中有些也差的遠呢。我想我們第一要務還是去留學求學要緊。現在破壞容易，等到革命成功，建設非實際人才不可。²²

¹⁹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03。

²⁰ 同上註。

²¹ 同上註。

²² 同上註。



楊步偉日後留學東瀛的抉擇，已在此埋下種子。受到外在環境的打壓與驚醒，楊步偉已經明白女性不能再拘泥於表象女性權益的盲從，而是將眼光根植於女性真正知識和能力的培養。

由此可知，不論是因為內在動機的覺醒，或者是外在環境嬗變的影響，楊步偉明白女性要有知識與能力，才不會重蹈傳統無知無識婦女之覆轍，想要不必依附男性而活，接受教育是追求與男性平等的重要環節。而且，女性想要和男性一樣接受教育，是女性主體意識萌發的展現。當同齡的女伴尚在父母的保護下，躲在深閨，過著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時候，這位女性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不同的人生抉擇，因為她們勇敢地走出家庭的範圍，外出到新式學校接受新教育。表現出年輕女孩勇敢的自主意識，面對挑戰的獨立人格，在此也表露無疑。因此，離家求學是達成年輕女性新意識成長的關鍵性決定，爭取外出求學的抉擇與行動，此舉具有展現其女性意識的重大意涵。

(一)爭取女性受教權

五四時期的女性知識分子適逢中國師法西方、西化、汲取新知的時期，女子教育學制的建立尚算完備，社會逐漸能接納女性受教育，因此她們在接受家塾的啟蒙教育之後，能夠進入洋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禮，甚至負笈海外進修。女性知識分子女性意識的覺醒(如獨立自主人格、豐富學識、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情形)，新式學校的求學階段深具意義，此階段是女性知識分子的自我女性意識成長、全體意識發展最為重要的時期。

當時社會，家中長輩們折衷於女子無才是德與讓女孩略受教育、識些字也無妨，女子在此矛盾風氣下受教育，更加彰顯她們相當珍惜與重視求學讀書的機會。

楊步偉進的第一所學堂，是官宦子女雲集的旅寧學堂。雖然，當時入學成績不甚理想，但是有機會接受新式教育，楊步偉形容自己的心情：「我起初還有點失望，可是進了這麼一個維新的新學堂是一件最滿意的事」²³。

然而，知識女性在走出家庭畛界進入學校後，在學期間學業成績與為人處世態度，都是觀察她們新女性意識覺醒的最佳詮釋。

²³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65。



一次，楊步偉幫室友解數學，她認為「好做極了」²⁴，地理她也「不覺得難」²⁵，可因此她生意上門了，「一下他們總來問我這個，問我那個」²⁶，竟被同學當起小老師來了。給同學幫忙(如教數學、教地理等)的消息漸漸傳到老師耳裡，老師不但沒責怪楊步偉，過一星期後竟將她升到甲班。到了甲班，楊步偉認為「我在甲班只國文比他們壞點；可別的都在他們以上，所以總是林、蔡、我三個人搶頭前三名。……，我是算學地理歷史都好，所以前三名總是我們佔的，因此鬧過一點小風潮」²⁷，「我在這個學校非常快樂，功課總好」²⁸。

由楊步偉進入新式學校接受教育的情形，她勤勉好學，事實上反映了更深層的意涵。她品學兼優的表現，印證女性的智識能力並不亞於男性，只要給予機會學習，女性是不會自我居限於閨閣詩詞文學的框限，女性的發展同樣也可以和男性並駕齊驅，揚棄女性是父權社會中心智拙劣的次等角色。其次，女性知識份子求學最大的影響，在於女性接受知識教育的啟發，增廣見聞視野，培養智識能力與自信心理，孕育堅忍意志與獨立意識。換言之，知識女性不論參與反抗校方或校外學生社會運動，或者日後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女性，這些勇於向傳統挑戰的知識與激進精神，已經在她們求學階段滋長與發展表露無遺。

文靜賢淑向來是中國典型女性教育的重心，但由另一種角度來看，這教育模式養成女性慣於被壓抑又不敢反抗，甚至毫無查覺的形象。受教歷程中，知識女性除了在學時期已經展現聰穎的本質與旺盛的求知欲外，更有女性知識分子就學時期已經參與抗爭的活動。如楊步偉因為不滿學校的作風，發起或倡導反抗學校風潮。

1908年，因為光緒與慈禧相繼去世，中西女學自認為教會學校，不願讓學生放假或舉行任何儀式。結果楊步偉聯合其他同學抗議學校看不起中國人，反對的聲浪下，中西女塾校方始准許學生放假，做國喪禮拜，帶國孝。

一九零八年光緒和慈禧太后兩人同在幾天之內死了，學生們要求放假和做一個特別禮拜算國喪。起初校長不肯，說我們是教會學堂，不管你們中國

²⁴ 同上註，頁 66。

²⁵ 同上註。

²⁶ 同上註。

²⁷ 同上註，頁 67。

²⁸ 同上註，頁 68。



事。學生們回他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怎麼能說不管中國事呢？教會是勸告人信教，不是教人不要國。這樣子我們覺得他太拿中國人看不起，全體大鬧起來，並公推漢文教員范子美先生去交涉，結果放了三天假。在禮拜堂做了一個國喪的禮拜。我們全體學生還紮上了黃頭繩子，就像外國人紮塊黑布似的表示喪事。²⁹

在參與學校抗爭行動方面，還有因為教會學校強迫學生一定要受洗入教的宗教校規而抗爭，

十月裡美以美會大年會，美國派大教士來，先到蘇州東吳大學和景海女校開會演講。完了就問誰現在懺悔來受洗禮？蔡蘇娟就站起來說我懂了，我現在願意受洗禮。蘇州各校大鬧起來，一下大家就傳到各處去，因為那時官家閨秀入教的還很少呢。蔡蘇娟就告訴她們校長白小姐說我在中西，教她們勸我入教。所以他們到上海來，白小姐告訴中西校長預備叫我也在那時候洗禮，我不肯。那幾天上下午和晚上都叫我到校長室去禱告，並叫我以前的英文先生孫小姐勸我進教。有一次在我牀前禱告禱告我睡著了。因為這大不敬的事，學校還給我記過。

後來弄得我真煩起來了，我對他們說我絕對不能入教的，因為我家裡一定不願意；雖然我祖父說宗教自由，可是我現在對這個一點沒有研究，入教也不過是盲從而已，我連活著做人我都要由我自己細想了再定如何，我現在怎麼肯給我的生後聽人說說就照著信了？他們見我再三不信，就高興，……。所以這都是我後來退學的原因。³⁰

在學校重重施壓下，她依舊不願意因學校規定入教才能畢業而改變初衷。楊步偉本人並未因為學校的處分而驚惶，益發更有女性應該作為自己主人的定見。

最後楊步偉不願依循學校強制入教的規定，和覺得新校長極度迂腐，她以「對誰沒有說再見就走了」³¹的方式，結束了在中西女塾的日子，同時也為自己在中國求學生涯畫上句號。

(二)赴日習醫，服務社會

²⁹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8。

³⁰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7~78。

³¹ 同上註，頁 93。



楊步偉留學日本，決定為社會貢獻心力，是她留學的原動力及目的。民元後楊步偉決定放棄革命行動，赴日本學習醫學。因為，楊步偉體認：「我的學醫將來是我自己本人成功一個專家，又可以救社會，並且中國現在很少女醫，而且極需女醫。辦教育人多，而去學醫的人少」³²。可知，她的習醫動機是為了社會的服務。審視女性知識分子在外國求學期間的情形，可以發現另種值得分析的現象。因為甲午戰爭清朝大敗的恥辱，使得許多有識之士的視野改觀了，紛紛遠赴先進國家學習新知，他們是想師夷之長計以制夷。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中國留學生全體罷課，日方則百般刁難，如強行留級、不發文憑等等，更說「你們要愛國就應該犧牲」。楊步偉氣得不拿文憑、不參加畢業典禮就回國了，畢業總平均91分。因此，對於國際關係楊步偉有她的想法，「我(楊)對於國際上的關係，是這樣想，一個人對他本國的愛國舉動，就是仇國也應該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說她不好。」³³

楊步偉到日本習醫的同時，卻感受到中國的留學生負笈海外的目的，已經有明顯變質現象。楊步偉回憶說：「我們在日本那時從中國來『上紬』留學漸漸的多了」³⁴。中國留學生方面，選擇留學日本是因為貪圖日本生活費便宜，路程近，「說句公道話我得承認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因那時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有好些人並部是未留學而去留學的。」³⁵，有許多留學生並非為了求取學問，自然不用心在學業上。

日本政府方面，不是刁難中國學生的入學，就是刻意忽略中國學生的學習能力。因此造成「這樣過過下去留日學生在中國漸漸成了次等留學生的名氣了，所以有好些日本回來的學生都要到歐美去上一層第二道的『紬子』」³⁶。楊步偉的一段話，日本國家和人民鄙視中國留學生的心態，不言可喻；另一方面，中國留學生本身不思上進的怠惰心態，恐怕是楊步偉備感憂心之處。除此，在日本中國留學生受到輕視，日本人對女性留學生的歧視更深。楊步偉在自傳中，娓娓道出她在日本習醫的期間，正值中日關係交惡，因而生活上和學業上遭遇到不少輕視的經驗，尤其是對中國女性的歧視，益加明顯。日本同學或當面提醒她中國是甲

³² 同上註，頁 125。

³³ 同上註，頁 144。

³⁴ 同上註，頁 142。

³⁵ 同上註，頁 141。

³⁶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42。



午之役的戰敗國，或說中日親善叫女學生乾脆嫁給日本人這類話語來刺激她，「有時也碰到同學同你談中日親善的，可是談談總提醒你甲午之戰中國敗的那麼樣。他們講親善還有一種講法，就是勸你們為什麼不嫁日本人」³⁷，對此，楊步偉說明「我也不想嫁日本人，我並不反對嫁別國人，可是我不嫁日本人，更不願做國際間間諜。」³⁸楊步偉這位天性樂觀的新女性形容這些冷嘲熱諷「是天天的家常便飯」³⁹。

不單單在生活層面被日本人輕視，學業上楊步偉也遭到受限制的不平等待遇，例如「醫校拿『顆粒結核性屍體』給中國學生解剖用。中國學生一點辦法也沒有。」⁴⁰。因為她最初的興趣是內科傳染病，但因為政府通知凡是學醫女學生必須一律學習產科，「我自己對內科傳染病最有興趣，可是監督處通知說政府已命令凡是女學生學醫的一概需學產科。」⁴¹楊步偉只有改變一途。有日本人輕視中國學生的環境壓力，也有中國學生不思上進的惡榜樣，難能可貴的是，楊步偉依舊堅持習醫的理想與努力，未嘗動搖。在日本四年五個月留學生涯至學成歸國，益加突顯這位近代中國新女性自立自強的堅定意識。

根據楊步偉的描述，在女性不宜拋頭露面的封建遺毒影響之下，女性知識分子爭取工作權幾乎都曾引發外界蜚短流長。顯而易見的，新女性尋求經濟解放的過程，外面環境與社會輿論的普遍反映是貶抑女性。換言之，社會整體環境對新女性經濟意識的覺醒，不但鮮少給予支持和資源贊助，反而是阻礙、壓制、歧視，這樣的社會環境不知讓多少有心參與社會經濟的女性，遭受打擊、卻步或心灰意冷。楊步偉曾經痛斥這般的社會現象，並極力主張：「我說我不怕，要是怕，我都不出來做事了。我是提倡男女不分界限的，品行上當然要守規矩，那樣才可以開人風氣之先呢」⁴²。省思楊步偉的主張，一方面，彰顯女性知識分子女性主體意識的堅定，令人感到佩服。另一方面，不免令人懷疑，在中國負面遏阻力量多於正面支持資助，反對聲音勝過讚許意見的父權主流社會環境，女性追求自己經濟獨立自主的歷程，又是多麼的艱難。

³⁷ 同上註，頁 141。

³⁸ 同上註，頁 145。

³⁹ 同上註，頁 141。

⁴⁰ 同上註，頁 140。

⁴¹ 同上註，頁 146。

⁴²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23。



四、楊步偉對女性工作權的爭取及表現

女性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在她們追求工作權的過程中充分表露無遺。突破傳統、要求解放、經濟獨立是她們共同的心聲，同時也反映同時代新女性對經濟自主和人格獨立的渴望。和其他女性知識分子相比較，楊步偉處理外界對職業婦女的不當傳言，所展現態度的正向而積極，是不遑多讓的。

(一)任校長

楊步偉於雙十年華任女子崇實學校的校長，也親身經歷社會以歧視眼光看待職業婦女的經驗。楊步偉一上任，學校裡外週遭環境就以質疑的眼光，看待這位少不更事的女性，不但懷疑她的年輕，更加質疑，一個女性是否有能力管理學校事務，勝任所謂校長的職務。

楊步偉上任後在學校內訂定一概不准抽煙的章程，可是學校資深齋務長特別跑到她面前抽煙，公然違抗規定。⁴³外界的情形，楊步偉由父親口中得知，別人稱她這位年輕的女校長為「特別的女上司」⁴⁴。楊父並且轉述別人的說法：「他還和我說過我們家真開通，興女學這麼早，昨天對我說話時，也像譏笑我的樣子。可想一個女子要解放出來做事是不容易的事。我想你還是早點回去，最好明天就走，免得人亂說」⁴⁵。當父親提醒她要小心外面流言四起的時候，楊步偉不僅不為之氣結，反到安慰父親：

一個女子要出來做事起頭一定要有人肯犧牲名譽，才能做的出來，可是自己做人要正派，行為上談笑不要緊，羞羞答答的還不脫女人的習氣又何必出來呢？我總覺得我們應該打破男女的界限，除了戀愛上，大家在一道做

⁴³ 「我本定的章程校內一概不准吃煙，他也說不該。可是這個齋務長特別到我面前吃煙，我以後給他辭退了。」同上註，頁 113。

⁴⁴ 同上註，頁 121。

⁴⁵ 同上註，頁 122。



事不要想有男女的分別就好了，總要有人肯起頭這樣行，才能提倡呢。⁴⁶

楊步偉面對學校內外壓力與性別歧視可見一斑。顯然的，社會整體環境並不支持女性參與經濟或職業公領域。面對別人譏笑女子解放與女性在外就業的不宜時，楊步偉不氣餒更不退卻，身體力行改變女性的社會期望行為與刻板印象。甚至為了表示女性平等的能力，年輕的她以身作則，甚至還為女學生和學校，勇氣十足做過攆鬼和監斬的事情⁴⁷。她還將學生中歲數大、不識字的學生分出來，教她們織布、縫紉、刺繡、織毛線等。凡識字的按成績編為兩級小學和兩級中學。當楊步偉卸任後，遂前往日本學醫，再回來，便是要開辦醫院了。

(二)辦醫院

一九一九年五月，楊父寄了信給楊步偉，信中說要給楊氏在同年八九月回國組織私人醫院，期間特到北京給楊氏買房子，預備改造醫院用，開辦醫院的手續及北京開醫院的情形則由當時內務部衛生司司長楊立德(楊氏之本家哥哥)所管理。在其父其兄協助下，同年七月，楊步偉的醫院順利開張，院名「森仁醫院」，「森仁」二字透露了楊氏的行醫理念，即「樹立醫道上的仁義發展向森林那樣廣闊」⁴⁸，就診病患大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員和家眷，可人託人的都來了。其時女醫師很少，忽然來了兩個青年中國的女醫生，又獨立開了個醫院，北京城內轟動一時，這顯示一般人都表示非常歡迎和恭維。

這看似安全又能得好名聲的職業背後，亦有其危險之處，在於年輕的女醫師不比男醫生，若有急診病患，不知是何種人家，再晚都只得提心吊膽的出診，治得好便好。楊步偉記述一次最使她害怕的經驗，就是一位吳團長，在天將近五點鐘時候，忽然派了輛車、四個憲兵就來打門，當時楊氏一群人都以為憲兵司令部捉人來了，好在虛驚一場，是來請去為吳團長之妻看病的：

我去診察過後一點毛病沒有，只胃裡瓦斯膨脹而已。……我的意思吃點藥就可以了，他們一定要打針，覺得打針好的快。這也是在中國行醫的一個怪現象，……⁴⁹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15~118。

⁴⁸ 同上註，頁 165。

⁴⁹ 同上註，頁 167。



半點鐘後這位太太醒了，說好了，馬上走出來對楊步偉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說簡直賽神仙，藥到病除，之後派車送楊氏回家，又送去了幾塊匾、兩抬箱禮物，又請到飯館吃酒席，席間恭維的不得了，但卻連一個錢的醫藥帳都未付，還花了楊氏十幾塊錢打賞車伕及看護。所以楊步偉總說她辦醫院是「生意茂盛，本錢乾淨」。楊步偉曾說其目的不僅止行醫，更想辦醫學校和訓練看護婦⁵⁰，為此她願意少數私人發起，組織一個董事會，捐點款，除醫院外，開少數女醫生和看護班，但是醫院要有手術室的設備、X光線，和細菌檢查室等等，成功一個私人設備完全的醫院。

由楊步偉任校長、辦醫院等爭取工作權及表現上來看，女性知識分子在經濟困厄與整體環境資源缺乏的條件下，主體意識覺醒現後，充分體現出女性努力爭取工作權以獨立人格，與積極改寫傳統女性之人生宿命觀，在在說明了新女性在職場上相較起男人還要備加艱辛，至今未變。

五、結語

五四，在中國近代歷史有其複雜的意涵及深遠的影響。五四不僅代表著政治上，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運動；社會上，激發學生愛國運動、工商業界抵制日貨運動、勞工運動和婦女運動。除了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革新運動，最重要的是，文化思想上的啟蒙。然而，五四知識分子引進了近代西方的新思潮，極力倡導文化傳統的改革，呼籲建立全新的中國。因此，五四的政治革新、社會改造及文化重建運動，造成中國社會鉅大的影響。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關切的問題當中，婦女解放是個迫切而實際的問題。與此同時，五四女性知識分子的興起，也是中國女權思想與婦女解放的重要里程碑。女性知識分子突破無才是德的舊式禮教束縛，接受教育獲得知識與能力。由知識的啟蒙與新思潮的洗禮，女性知識分子女性意識開始覺醒，她們爭取自己婚姻的自主權利，進而參與職業與社會活動，展現經濟

⁵⁰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71~172。



獨立自主的才能。五四女性知識分子的女性意識覺醒與發展，深具婦女解放的歷史意義。

中國社會對婦女的關懷，絕不是在五四一朝一夕形成的，必須溯源自中國婦女長久以來受壓迫與歧視的歷史真相。百年前，絕大多數的婦女在男尊女卑封建禮教束縛下，女性的身體、思想、行為及才能深受社會規範之桎梏。女性的肢體受到殘害，不能受知識教育，沒有行動自由，缺乏謀生能力與知識，遑論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或地位。事事仰仗男性或家庭供給的女性，無疑是中國父權社會深居閨閣的囚徒、男性的玩物、家庭的奴隸、社會的附庸。當清末知識分子省思振興國族之際，歐美思想漸次傳入中國。受到國內政治現狀與西方女權思想的衝擊與影響，知識分子驚覺體弱無知的婦女與國家民族的衰敗之間，息息相關。頓時，女性資源的開發成為中國救亡圖存的新契機，知識界提倡改革女性生活和權利的論述與行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女性知識分子個人教育過程，雖然我們無法斷然地說，優渥的經濟環境必定能夠造就出深具女性意識的知識婦女，也就是說經濟的優勢，並不是養成擁有女性意識的知識女性之充分條件。但是試想若是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支持，女性知識分子受教育的機會，必然大受影響。由此可知，經濟因素是影響培育女性成為知識界一分子，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五四女性知識分子的孕育、養成和影響，是中國近代婦女女性意識成長最真實且具體的展現。楊步偉出身於官宦名門世家，家庭中長輩的開明思想態度與思想上的啟蒙，是孕育其成長的原動力。新時潮的衝擊，楊步偉的長輩不再讓女兒受纏腳之苦，也願意送女兒上學接受知識教育，但是能夠開通至接受女性婚戀自主的家庭，畢竟少之又少。同樣地，也因為出生於簪纓望族，封建遺風所及，無法倖免於家長包辦婚姻與受制於大家庭制度的苦楚。掙脫家長包辦婚姻的束縛，往往是女性知識女性意識覺醒必須克服的首要難題。楊步偉接受新教育和新思潮的洗禮，以及目睹許多婦女同胞不自由婚姻的悲劇，縱然夾處於家庭親情與社會環境的壓力，楊步偉毅然決然主動採取寫信退婚、逃婚等方式，反抗舊式婚制的束縛。解除舊式家長包辦婚姻的枷鎖之後，知識女性進而以新式戀愛和結婚方式，積極追求屬於自己的感情世界。當中，楊步偉的「新式人物的新式結婚」，是女性知識分子表達婚姻自主的最佳例證。受到五四男女平權思潮的衝擊，女性



知識分子藉由知識教育的洗禮，她們可以說是婦女界主體意識覺醒的先驅分子。

受惠於清末女子教育制度的設立及社會風氣的漸漸開放，女性知識分子有機會從深閨內院走出，在不同的教育機構接受傳統或新式教育的薰陶。教育可以說是造就女性知識女性意識發展最重要助力，因為在舊式中國社會女性沒有接受教育權利，長期被摒除於男性專擅知識領域的時代，獨立自主意識和人格是不可能的。大體而論，知識女性想要接受教育的原因，主要是出自於她們個人內在想求上進的動機，以及受到當時外在社會環境的衝擊。不論是內在動機或外在環境的影響，顯然地，女性知識分子們已經明瞭女性也必須受教育，才能獨立自主，因此教育成為新時代女性求取兩性平等的重要原動力與助力。尤其當知識女性爭取離家外出求學的決定與行動，這樣的抉擇已經展現了女性們女性意識的覺醒。

女性知識分子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及外國求學的階段，是她們知識與能力增長最快速的階段，同時也是她們女性意識發展最為顯著的時期。在學期間，女性們個個聰穎好學，扭轉傳統社會認定女性有德無才的刻板形象。楊步偉，還因為求學時遇到校方在宗教或學校事務方面不合理的規定，學校不願意參與國事，而採取抗爭行動。知識女性不再是無聲無息的承受者，反而主動採取向學校抗議或爭取行動。她們的抗爭行動不僅顯示知識女性掙脫中國傳統「文靜賢淑」女教的束縛，展現勇於突破的新女性面貌同時，她們愛國的群體意識也表露無遺。甚至就在就學時期，部分知識女性已經開始參與社會活動，益加彰顯她們爭取女性權益與革新社會的激進思想及行動。

外國求學經驗對女性的影響，則是因女性而異。楊步偉立下貢獻中國社會的決心。在外國求學期間，見到自己同胞或其他國家婦女受到歧視和不平等的待遇，日本歧視中國女留學生，這些親身的經歷更加堅定知識女性們致力改變女性地位低落與爭取女權的決心。我們可以說，教育的知識啟蒙和能力培育，賦予女性知識分子參與公共社會的權利和能力，教育改變了她們的一生。

五四以後，女權思想及體育觀念的變革。在婚姻方面，婚姻對女性的束縛與迫害，向來是最為人所詬病。因為家長包辦的舊式婚姻制，從不考量女性的人格與意識，女性更沒有掌控自己身體的能力和權力，女性的身體成為家族間權力結盟歷程中交換的物品。五四新女性高舉反抗傳統包辦制婚姻的大旗，就是為了反抗這種壓制女性身體與意志的父權思想下進行。新女性爭取戀愛與婚姻的自主權



利，要求男女社交公開，甚至社會上自由婚戀和離婚的情形日益增加，也受到輿論的善意支持。還有，反對片面貞操觀，贊成女性抱持獨身主義與寡婦再嫁的論見，連節育的觀念(楊步偉有提倡節育觀念)和知識也進入中國。

在工作方面，婦女工作權的爭取及表現，還有助於廣大普羅婦女的解放。其中，又以經濟獨立可以賦予女性自主生活能力及提昇人格地位，更能凸顯婦女職業與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密切關係，把它視為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流變中，「娜拉出走」引發的後續發展與影響，未嘗不可。面臨社會輕視與不支持的壓力，女性知識分子不畏艱難，勇於突破困境。楊步偉就主張女性外出就業，打破男女的界限，首先要改變自己，女性要正派，不要再羞羞答答。後來楊步偉在北京開辦的醫院，也是辦得有聲有色。

總之，五四新女性的經濟工作參與，是女性人格化、社會化的起點，兼具女性脫離男性附屬品物化地位的表象改變，以及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實質變化。即使到了現在，女性的角色依舊無法於賢妻良母與職業婦女間取得完全的平衡，但是婦女經濟的參與，從婦女史的角度看來，仍是意義非凡。

由此，楊步偉這「一個女人」，可說是「開風氣之先」的新女性，以女性主體的出發點，勇於解放自己的心靈、思想與身體，活出真正的自我意識，充分顯揚中國社會男女主客體的易位，自我表達、自由抉擇的女性意識普遍成長。總而言之，楊步偉這個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在女性意識的自覺自醒，以及對婚姻、教育、工作權的爭取上，都是值得肯定與讚揚。



參考書目

一、專書

林語堂著：《金聖嘆之生理學》台北：德華出版社，1980年初版。林語堂著：《八十自述》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6月，初版。

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臺北：麥田，民86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2年6月1日再版

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縣：稻香出版社，1999年

二、期刊論文

呂芳上主編，〈192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張莉，〈從「女學生」到「女作家」——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二期。

張昌華，〈教我如何不想他一趙元任和楊步偉〉，《江淮文史》，2007年第四期。

張宛青，〈一位開風氣之先的婦女——記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江淮文史》，1997年第二期。

楊國樞，〈知識份子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知識份子與台灣發展」研討會總結報告〉，《中國論壇》，第265期，1986年10月。

三、報章

殷柏，〈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的批評〉，《大公報》，1919年11月19日。

大公報記者，〈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大公報》（長沙版），1919年11月19日。

四、網路資料

《二十一世紀》網路版，二〇〇八年三月號，總第72期，2008年3月31日。登入日期2013年5月20日。

